

内 容 提 要

从2006年以来,围绕着对改革的不同评价而引起的思想碰撞和社会事件此起彼伏,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而且,对中国未来的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书是著名记者马国川继《大碰撞:2004~2006年改革纪事》之后,推出的又一部反映改革的力作。作者以理性、中立的视角,客观地描述了从2006年到党的十七大期间的各种新闻事件,是第一部全景式反映近两年社会思潮激荡的作品。作者在叙述一个个新闻事件时,在保持客观性的同时,综合运用各类表现手法使得新闻有趣,充满了可读性,很有感染力,而且,引人深思。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争锋/马国川著. —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08

ISBN 978-7-5084-5317-0

I. 争… II. 马… III. ①报告文学—中国—当代②经济体制改革—概况—中国 IV. I25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20331号

书 名	争 锋
作 者	马国川 著
出版 发行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北京市三里河路6号 100044) 网址: www.waterpub.com.cn E-mail: sales@waterpub.com.cn 电话: (010) 63202266 (总机)、68331835 (营销中心)
经 售	北京科水图书销售中心(零售) 电话: (010) 88383994、63202643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和相关出版物销售网点
排 版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微机排版中心
印 刷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规 格	787mm×960mm 16开本 20.5印张 379千字
版 次	2008年3月第1版 200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00001—20100册
定 价	38.00元

凡购买我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的,本社营销中心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卷首语：为了迎接中国发展新阶段需要 研究的若干重大问题

吴敬谦

如何评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路线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路线，究竟是一条应当坚持的正确路线，还是一条应当否定的错误路线？这是过去两年从党内开始继而波及整个社会的第三次改革大争论的焦点。在这场争论中，传统路线的支持者重弹他们在1989~1991年大争论中唱过的“取消计划经济，实现市场化，就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旧调，指责改革。他们把中国改革说成是“由西方新自由主义主导的资本主义化的改革”，指责改革的领导人是“背叛了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走资派”和“资改派”：“一是经济上继续推行私有化”，“中央领导在上边极力号召各地‘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闭口不提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二是在政治上继续推行自由化”，“具体表现就是抛弃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背叛无产阶级专政”，“这两年，中央莫名其妙地提出一些没有阶级性和革命性的口号和主张，例如什么‘以人为本’、‘和平崛起’、‘和谐社会’、‘小康社会’等”。“三是在外交上继续实行投降妥协的路线。我们党这些年根本不讲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了，也不提帝国主义。新班子上来也不讲”。“在改革中，私化、西化、腐化、分化基本完成，并且一再借改革开放在制度上肯定下来，培养了一些亲美的新资产阶级分子。”^①他们还攻击说，当前医疗、教育

^① 马宾（2005）：《关于对当前的形势的看法和建议》，载《论形势与任务》（白皮书），第59~64页，2006年2月版

体制存在的弊端以及国有资产流失、贫富两极分化乃至矿难频发等问题，都是由这种市场化的“资改路线”造成的。^①

据此，他们提出的“革命任务”是：“学习文化大革命文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文献”，彻底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平反昭雪”，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打倒国内的垄断资产阶级和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还“应当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②

改革开放反对派的这种宣传鼓动，已经造成相当大的思想混乱，其阻挡改革脚步、破坏社会和谐的消极后果正日益明显地显露出来。

他们对改革开放的指责是不是真有道理？回到“左”的路线重拾“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甚至“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实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对我们的民族意味着什么？对所有这些问题，都很有必要给予明确的回答。对于他们引为口实的种种社会问题到底是由改革造成的，还是由于改革受到阻碍因而不到位或不彻底造成的，也需要正面讲清楚。否则将无法团结全国人民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建设富裕、民主、文明和和谐的中国。

什么是我们追求的社会主义目标

改革的反对派攻击改革开放的重要的论据，是说改革开放背弃了社会主义目标。

问题的症结在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什么是值得为之努力奋斗的社会主义目标？

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历来有不同的看法。从一开始，社会主义者所追求的目标，就是社会公正和人民的共同富裕。过去在社会主义各国流行的说法却是一种从原苏联搬过来的国家主义曲解。它把社会主义的基本

① 参见“毛泽东旗帜” <http://maoflag.net/>，“中国与世界” <http://www.zgysj.com/>，“乌有之乡” <http://www.wyxsx.com/>等网站

② 马宾（2006）：《纪念毛泽东》（白皮书）

特征规定为：①国有制的统治地位；②实行国家计划。或者用1996年所谓“第三个万言书”的说法：“国有制是公有制的高级形式和社会主义必须追求的目标”^①。为了追求这一目标而进行的全面国有化，以及“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是全面的贫穷和几千万人的生命损失，因而遭到了人民的唾弃。

在经历了“左”的路线横行造成的巨大灾难之后，邓小平根据从事领导工作几十年的切身经验，透彻地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苏联的说法也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的社会主义模式，带来很多问题。”“1958年经济上搞‘大跃进’，使生产遭到大破坏，人民生活很困难。1959年、1960年、1961年这三年非常困难，人民饭都吃不饱，更不要说别的了。”“1966年开始搞‘文化大革命’，搞了10年，这是一场大灾难。”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些问题才逐步得到解决。按照邓小平的说法，“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的原则”、“社会主义的任务”、“社会主义的目的”、“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不是别的，而是“解放生产力，逐步实现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②

可是近几年来，一些传统体制和传统路线的支持者再次搬出原苏联教条，根据原苏联的社会主义定义断言邓小平和中共领导“执行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走了一条资本主义复辟道路”；与此同时，他们大肆为那些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倒行逆施翻案，甚至断言“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历史性的人民革命”，“文化大革命就是好”！^③

在这种情况下，辨明社会主义本质，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开放，就成为政治上的迫切需要，也正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对自己的党员和干部进行党的路线教育所必须完成的首要任务。

① 《当代思潮》特约评论员（1996）：《关于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若干理论和政策问题》，摘要载《当代思潮》，1996年第4期

②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64、110～111、123、142、155、227、261、364、373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③ 参见“毛泽东旗帜”<http://maoflag.net>，“中国与世界”<http://www.zgysj.com>，“乌有之乡”<http://www.wywx.com>等网站

现代化过程中社会分层的新 变化和对中等阶层的政策

如何对待在现代社会中崭露头角的中等阶层（西方统称为“middle class”，在中国，有时也译为中产阶级或中等收入阶层），对任何一个现代政党而言都是一个性命攸关的重大政治问题。

各国现代化过程中社会结构的一个重大变化，是以各类专业人员为主体的新中等阶层（新中产阶级）的崛起和取代传统社会中的权贵阶层，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这种趋势在中国社会中也开始表现出来。包括技术人员、经理人员、教学科研人员、医护人员以及公共机构工作人员在内的专业人员的队伍不断壮大，在社会经济体系中的作用也愈来愈大。按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他们是工人阶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执政党必须依靠的基本社会力量。但是，一些顽固坚持“左”的错误思想的人继续把专业人员看作一种异己的力量，把知识分子说成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或者“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对象。在1989~1992年的改革大辩论中，市场化改革的反对派甚至宣称，“中产阶级”是“最危险的异己阶级”，主张对他们采取限制和压制的政策^①。只是在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对那些反改革的“理论家、政治家”的言行痛加批判以后，他们才有所收敛。不过，他们始终没有放弃这种“左”的错误观点。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党政领导一再重申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方针和发挥专业人员积极性的政策，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还确定了“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正确方针，但在几次“左”倾思想回潮中，传统路线的支持者仍然利用一些人的民粹主义情绪蒙蔽“弱势群体”，挑拨他们与中等阶层之间的关系，煽动“反精英”和“仇智”。这种宣传鼓动，已经造成部分社会关系（例如医患关系）的紧

① 柳红（2002）的《当代中国经济学家学术评传：吴敬琏》对当时的争论情况作了较为详细的叙述，见该书，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31~233页

张状态，严重损害了专业人员发挥聪明才智、服务社会和企业家人群体艰苦创业、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对构建和谐社会形成威胁。对于这种社会动向，必须认真对待。

关于分配政策的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党政领导针对“左”的路线下平均主义极大地损害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和抑制了经济效率提高的严重情况，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方针。根据这一方针，我国在赤贫人口大幅减少和居民收入水平逐步提高的情况下适当拉开了收入差距。这种变化得到了广大民众的理解和支持。但是，主要由于腐败和垄断等非市场的原因，20世纪80年代以后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全体居民的基尼系数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突破了0.4的公认警戒线。党的十六大根据这种形势，对我国的分配方针作了进一步的规定，提出要在“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同时，采取“合理调节少数垄断性行业的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和“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水平”的政策，以期更大程度地实现社会公正和逐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

可是近年来，由于预定进行的改革推进乏力，限制行政权力和打破垄断等有利于缩小贫富差别的改革措施没有到位，腐败活动有增无减，使收入差距继续扩大，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

然而在最近几年的争论中，少数人极力散布他们对贫富差别过大的原因所作的歪曲解释，把大众对于腐败的义愤引向错误的方向。他们说，目前贫富差别悬殊的根本原因，不在于腐败和垄断，而在于市场化改革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方针。他们以此蒙蔽和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转移视线，把大众“仇腐”的正当感情引向不分青红皂白地“仇富”的歧路。在政策取向上，也就不是针对贪官污吏和“红顶商人”的非法收入，而是针对专业人员的合理报酬和企业家的合法利润；鼓吹对高层经理、教授、医生、高工等的工薪收入进行限制或课以重税。

面对这种平均主义歪曲，应当对近年来我国收入差别扩大的

实际状况和根本原因作出科学的分析和判断；同时，要采取应对措施来有效地解决贫富差别过大的问题。分配政策影响深远，必须审慎地作出决断。

如何推进政治改革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正如邓小平和中国领导人多次说过的，“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然而，在中国这样一个没有民主传统和习惯的国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民主政治，又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根据世界各国的经验和中国的实际情况，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应当采取积极而稳妥的方针，稳步地向前推进。

按照这样的方针，我以为，目前应当进行以下两方面的工作：第一，认真总结我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经验，特别是1986~1988年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经验和2002年党的十六大对于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如何改革执政方式的探索，争取在充分吸收前人智慧和历史教训的基础上，用两到三年的时间制定出政治改革的总体规划施工蓝图。第二，在以下方面着手进行改革：①解决长期存在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实现党政分开；②在依法可依、司法独立和依法行政的基础上建立法治的基本框架；③实现党内民主的制度化；④逐步扩大公民的民主参与；⑤进行传媒改革，使言论自由和言论责任都得到保证。

在以上五点中，邓小平把其中的第一点即实现党政分开放在首位，然而这又是一个一直存在着较大争议的问题，需要通过认真的讨论取得共识。

邓小平历来把克服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错误做法，实现党政分开看作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关键^①。早在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就在论述抗日根据地民主建设时鲜明地提出过“反对‘以党代政’”的口号。他尖锐批评了把党的领导误解为“党政

^① 邓小平（1986）：《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63~164页

不分，以党代政”，“党权高于一切”的错误观念，要求改变“包办一切”、“遇事干涉”的错误做法，肃清“‘以党治国’的国民党遗毒”^①。虽然在1942年中共中央作出“九一决定”，要求各根据地建立党委的一元化领导以后，邓小平没有再正面批判“以党治国”的提法和做法，但是他并没有放弃必须实行党政分开的基本想法。他不但在1993年指导编辑三卷集的《邓小平文选》时把上述1941年的讲话放在全书卷首第二篇，而且把克服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弊端，实现党政分开确定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首要任务。他在1980年8月18日所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纲领性报告中指出，“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权力过分集中”，“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是出现官僚主义、机构臃肿、滥用权力、压制民主、专横跋扈、贪赃枉法等弊端的制度性根源。他说：“这种体制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现在再也不能不解决了”，要求立即着手进行改革。在这个报告中，邓小平还提出了实现党政分开的一系列具体办法，包括：今后凡属政府职权范围内的工作，都由国务院和各级政府讨论，不再由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发指示作决定；改变党委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实行工厂管理委员会、公司董事会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改变党委领导下的校长、院长负责制等^②。1986年，他更三番五次地指出实现党政分开的重要意义。他说：“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③

① 邓小平（1941）：《党与抗日民主政权》，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21页

② 以上均见邓小平（1980）：《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27~342页。1980年8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邓小平的这一报告

③ 邓小平：《1986年6月2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1986年9月13日在听取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汇报时的讲话》、《1986年9月29日在会见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雅鲁泽尔斯基时的讲话》和《1986年11月9日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的讲话》，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63~164、176~180页

邓小平的这些思想在1986~1988年的政治体制改革实践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体现。虽然这一试验没有进行下去，但是它的经验和教训仍然是我们在规划今后的政治改革和制定具体的改革措施时应当认真研究和汲取的。

2008年3月10日于北京

序言：改革“而立”之年话“争锋”

邹东涛^①

伟大的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说过，就像太阳从东方升起向西方沉落一样，人类文明也首先起始于东方。在中国，曾经有过文明的太阳高照的时候，那就是华夏文明独领风骚的时代。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世界东部的那只雄狮睡着了，华夏文明衰落了。天行健，雄狮自强不息，在地球旋转到20世纪后半期又醒来了，自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2007年12月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9周年，也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到了“而立”之年、亦即步入30年。

我自1978年以来就深深“沾染上”改革情结，30年来思考从未松懈、笔耕从未停止。我刚刚读了青年记者马国川的著作《争锋》，我把他2006年10月由新华出版社出版的《大碰撞——中国改革纪事》（以下简称《大碰撞》）一起摆在我的案台上，思绪万千、浮想联翩。“争锋”者，争论的碰撞与交锋也。“争锋”使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图景在我脑海中洪波涌起，在这一壮阔的洪波中又交织叠加着三次大争论的沸腾浪花，形成一幅浩瀚而壮观的图景。《争锋》和《大碰撞》使得中国改革开放第三次大争论条理分明地跃然纸上。富有特色的是，作者在这两本书中做的都是客观系统的“史记”或“实录”性工作，对“碰撞”和“交锋”的各方既没有“捧谁”，也没有“棒谁”，这就可以让“争锋”“碰撞”的各方与读者来欣赏和评价。

30年，这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白驹过隙的短暂一瞬。但由于近30年来改革开放稳操胜券，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走上了中华

① 邹东涛，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享受者，世界生产力科学院院士，中组部直接联系的知识分子。先后就读于西北大学物理系和经济管理学院。先后任国家体改委经济体制改革研究院副院长兼国有企业改革试点办公室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兼中国社会科学院学位委员会秘书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总编辑，特聘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发展和改革研究院院长。出版著作《十字路口上的中国》、《什么粘住了西部腾飞的翅膀》、《中国经济体制创新》（获2005年度中国生产力理论与实践优秀著作特等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获2007年度中国生产力理论与实践优秀著作特等奖）等20余部，主编丛书《世界市场经济模式丛书》（获1995年度中国十佳图书奖）、《中国改革开放20年》（获2000年度中国图书奖）、《中国改革攻坚》等150余卷，发表《制度更是第一生产力》等论文1000余篇。

崛起的快车道，世界称奇，环球惊诧。在当今世界，若要谈改革开放的成功，言必称中国。无论是国内专家，还是国际社会，都在纷纷探索“中国改革开放成功之谜”和“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之谜”。中国这30年完全可以称之为“改革开放盛世”，这个盛世比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23年还多出了6年，而且中国的改革开放还继续在盛世之道上挺进。

按照一般的常理，在中国改革开放快要步入30年的前几年，应当是一派莺歌燕舞庆盛世的景象。然而，却在“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中生起了“烽烟四起”的大争论。尽管邓小平同志生前多次强调“不争论”，甚至还把“不争论”作为自己的重大“发明”，但中国改革开放尚未满30周年，就已经发生了三次大的争论。而就争论的广度、深度和时间的长度而言，则以这几年的第三次争论最为剧烈、最为深刻。

在这几年的争锋中，一个长期跟踪中国改革开放研究、并直接参与过改革实际工作的我，除了在2006年11月应搜狐网邀请接受了一次题为《经济学的国民性》的访谈，以及后来应邀在阳光卫视与陈平董事长进行了分六集播放的对话外，没有对争锋各方有任何“亮剑”。但我却始终关注着各方的“碰撞”和“争锋”。所以，马国川同志到我办公室来拜访，请我为《争锋》写序，我当然是欣然应允了。我想，既然有“碰撞”和“争锋”，我们就不必回避，不能作鸵鸟把头埋在沙子里，而必须面对和正视。搞清争论的来龙去脉和方方面面的情况，对继续推进改革、完善改革、深化改革必有好处。

作为一篇序言，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对每一篇文章、每一种争论意见一一对应或评或颂，只想在设计争锋的有关重大思想理论方面的问题发表自己一孔之见，以与“碰撞”者、“争锋”者和读者讨论。

一、以平和的心态看待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三次大争论

有不少人把我国近几年烽烟四起的大争论看得“糟得很”，不是吗？你看：有人“骂改革”，有人“妖魔化改革”，有人要“否定改革”，有人要“搞资本主义的改革”，真是天下大乱了，这还得了。但就我来看，“争锋”越是“刀光剑影”，我心里越是感到兴奋，因为我从这些“刀光剑影”中看到了中国的生机勃勃，看到国民中都充满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血性，都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地献计献策。如：有的坚决保护民族工业，声明“卖什么都可以，但‘卖国’不行”；有的坚决反对国有资产的流失和国企改革中的腐败；有的坚决支持和保护民营经济的发展；有的坚决反对否定市场经济、理直气壮地为市场经济鼓与呼；有的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开放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社会主义方向。这些都是掷地有声的阳刚正气。

但什么是保护民族工业和怎样保护民族工业？什么是保护民营经济和怎样保

护民营经济？什么是否定改革和怎样坚持改革开放？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坚持社会主义？看法就不一致甚至大相径庭了。这就必然发生分歧和争锋。如果大家都异口同声、舆论一律地发表同一种观点、持同一种主张，岂不是太死气沉沉。“争锋”的价值就在于各抒己见，坦率地发表自己的理论观点、政治主张和政策建议。这种“争锋”，可能语言“白刃相见”，文字“枪炮对垒”，甚至闹到要去“公堂诉讼”的地步，如毛泽东所说“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那也没有关系。问题总是在“争锋”中理清的，办法总是在“争锋”中出炉的，改革是在“争锋”中不断完善的。如此“争锋”，不亦乐乎！

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在山区贫困农村亲历过贫下中农“端起碗喝稀汤，放下碗歌颂党”的感人情景，那个歌颂是真正朴实的表现，绝不是逢场作戏，绝没有装模作样。而经过 30 年的改革开放，社会财富的增加和人民水平的提升不知好了多少倍。但在酒醉饭饱时期却滋生出了“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这种“骂声”与“争锋”交织在一起，就使这个社会这个时代显得更加复杂，以致出现了“妖魔化官员、妖魔化政府、妖魔化党”的声音。

越是如此，我们越是要冷静。首先应该看到，有意见有气者能够在“骂声”中宣泄自己的不满，理论界能够“争锋”，这些都表明我国社会的民主气氛增强了，这显然是社会进步的表现；还应该进一步看到，“骂声”和“争锋”还可能是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动力。因为认真倾听、理性分析各种“骂声”和“争锋”，着力于解决改革和发展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有利于更好地推进改革攻坚、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还应当历史地看到，我国的改革既然是“摸着石头过河”进行的，无论是党、政府、群众和社会各界都在“摸”，在“摸”的过程中都可能踩几脚泥浆、碰几块礁石、陷几次旋涡、呛几口水。这一切，应该以平和的态度对待之，以理性的态度分析之，以积极的、建设现实主义的态度处理之，共同总结经验教训，认真清理“摸着石头过河”中水深、水速、旋涡、淤沙、泥浆、礁石的情况，开拓未来，为改革攻坚、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建设和谐社会修桥建路。

要使全社会都知道这个道理：任何历史发展过程都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旧的问题解决了，还会产生新的问题；旧的“争锋”过去了，还会产生新的“争锋”。矛盾和问题的产生→解决→再产生→再解决→……这个过程永远不会完结，这就是历史发展的辩证法。

二、以理性的态度揭示中国改革开放存在的深层次矛盾

既然有争论，我们就不必回避，不能做鸵鸟把头埋在沙子里，而必须面对和正视。我国经过 30 年的改革，好改的、容易改的，差不多都改过了，该“啃”的“肉”基本上都“啃”完了。留给现在和今后改革攻坚的任务，大都是难度较大的

环节和问题，是啃硬骨头。对此，大家都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1.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改革攻坚的对象和内容发生了多方面的变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对象是原有计划经济旧体制，但原有的计划经济旧体制不可能是永远没完没了的存量。改革开放的过程是一个不断“破旧立新”过程，每一改革时点建立的新体制因素，在实践中都存在着对这种新体制的不断检验。其过程有两种情况：一是当实践证明这种新体制因素符合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它就会继续保存和完善；二是当实践证明这种新体制因素符合了一段时间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但后来又成为进一步发展生产力的阻碍因素时，客观上则要求再革除这种“新体制”因素。对这种“新体制”可称之为“过渡性体制”。可以把旧体制分为两类：一是“旧的旧体制”，即改革开放之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二是“新的旧体制”，即改革开放过程中的“过渡性体制”。随着改革时间的延续和改革程度的加深，“旧的旧体制”逐步减少了，而现存的旧体制大多属于“新的旧体制”。这就要求在今后的改革攻坚中，不断探索对各个阶段不同旧体制改革的途径、方法和举措。

2. 改革过程的“两个规律”和当前面临的严峻问题。改革过程中在某些方面和某个时段，客观上存在着两个规律：一个是“改革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另一个是“改革的边际成本递增规律”。在改革开放早期，改革的成本比较低，由于那时人们的收入水平非常低，国家对人民也具有“还账”责任，改革的成本一般都由国家支付。随着改革的深化，难度越来越大，成本就越来越高，国家已不能完全支付，逐步下移到地方、部门和个人支付。无论是“改革边际收益递减”，还是“改革边际成本递增”，都会使人们对改革产生消极和“利差”的预期，从而减少参与和支持改革的热情，甚至站在改革开放的对立面骂起娘来了。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人们在经济方面的需求和在非经济（如生活质量、比较利益、政治和社会参与等）方面的期望会越来越高。当各种期望得不到满足时，不仅会减少改革热情，而且还会产生严重不满骂起娘来。

3. 利益的多元化形成了整个社会全方位的对策与反对策博弈。以利益竞争为导向的市场化改革，客观上形成全社会的多元利益主体：个人、企业、非政府组织等，这些多元利益主体的活动必然与政府，包括地方政府、国家部委、国家事业部门、中央政府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利益导向竞争为动力的市场机制固然会使整个社会充满着生机和活力，但微观经济活动常常在整体上体现出来的是规则凌乱的“布朗运动”，需要国家的协调，而国家的协调要依靠各个微观经济单位同中央政府同心同德。然而在实际经济活动中，所有利益主体首先着眼的是自身的利益，如果国家的改革方案以及各项宏观经济政策对自身有利，就能够与政府同心同德；如果不利，则会成为与政府“抗衡”博弈力量，这就形成了全方位的利益博弈格局。这种全方位的博弈主要表现在：①个人（公众）之间的博弈，如岗位、升迁、声誉、利益的博弈；②企业之间的博弈，如市场份额的博弈；③企

业与政府的博弈，如管与放、增税与减税的博弈；④地方政府内部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如政绩博弈；⑤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博弈，如分权与集权的博弈；⑥非政府组织内部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博弈；⑦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的博弈；⑧国家部委内部和国家部委之间的博弈，如事权、政绩博弈；⑨个人、企业、地方政府、非政府组织、国家部委等与中央政府的博弈。博弈的基本行为方式就是对策、反对策、反反对策……这个过程永远不会完结。这种全方位的对策与反对策博弈，大大增强了改革的难度，也大大增加了整个社会各个方面、各个阶层的矛盾和摩擦。

三、理性分析收入差距与贫富矛盾

这几年“争锋”愈演愈热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是收入差距的扩大、贫富矛盾的增强以致“仇富”思想的恶性衍生等。对这一问题必须冷静思考、分析和处理。

1. 关于基尼系数。基尼系数是世界上用来分析收入分配差距的基本指标。首先，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基尼系数发生了巨大变化：1978年为0.18，现在已接近0.5，而基尼系数的国际警戒线是0.35~0.4。这成为“争锋”和媒体炒作最热的问题之一。作为清醒的学者、官员和媒体对此都应该冷静点。首先应当认识到，与改革开放前普遍贫穷条件下的绝对平均主义相比，我国的基尼系数逐步增加，这是改革开放的成就和社会进步的表现；其次，从整体上来说，我国当前的收入差距还不是全局的，“奔腾式”的甚至是“对抗性”的矛盾，似乎社会即将崩溃、世界末日就要到来一般。其三，对于已经存在的收入分配方面不合理问题，特别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度拉大严重的问题，国家绝不能熟视无睹、听之任之，必须高度关注。其四，面对收入分配尤其是两极分化方面问题，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和努力实现；但切忌在舆论上切不可盲目和过度渲染，因为过度渲染无益于解决问题，反而会对现存的问题和矛盾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2. 关于“仇富”思想。“仇富”思想古已有之，并不是当今改革开放的产物，对“仇富”思想要具体分析。一种是平均主义思想太严重的人，一看见别人吃、住、穿、行比自己好，就气不打一起出、生出“红眼病”来，就如一首歌所唱的：“只要你比我过得好，我心里就受不了。”这种见富就仇的思想是一种不健康的病态心理；另一种是当社会贫富差距整体上确实非正常地过度拉大了，或者出于对穷人的同情，或者穷人出于渴求公平的心理反应，这是正常的。其实，在我国大可不必把人们的“仇富”心理看得太绝对、太普遍了。比如，正常投资、经营包括炒股发财的人；许多口碑好威望高的影视、演艺界、体育界明星；因科技发明创造得到国家大奖，或者因专利而发财者，我从来没有听到别人骂过、仇过、恨过。美国的比尔盖茨、中国香港的李嘉诚，是世界级巨富，有谁骂他们、仇恨他们呢？

有必要把“仇富”的对象搞清楚。我感觉人们“仇”的，一是“权贵资本”，包括利用公权利搞腐败的贪官和老板；二是那些搞假冒伪劣、坑蒙拐骗黑心商人；三是利用企业改制鲸吞国有资产的人；四是偷税漏税非法所得者；五是不顾工人死活、克扣拖欠工人工资黑心老板；六是因行业垄断而收入过高者，等等。对这些富人的仇恨不仅是正常的、健康的，而且是推进社会进步、深化改革的动力。国家应该对这些人严厉制裁，以平民愤。

3. 关注社会弱势群体，但不要搞民粹主义。处理好收入分配关系，协调收入分配的过大差距，实现贫富和谐，关键是要解决好社会弱势阶层的过低收入和贫困状况。同情社会弱势阶层，是社会公众一般的心理趋向，也是中华民族自古具有人文关怀优良传统的表现。但高度关注社会弱势群体要谨防“民粹主义”倾向。民粹主义（Populism，也可译为平民主义）是在19世纪俄国出现的一种影响较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其基本理论包括：极端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极端强调平民的利益、意见、公决、创制权等。这里在分析收入分配关系中借用“民粹主义”的概念，是指反对收入分配差距、绝对“妖魔化”富人、否定市场竞争、崇尚平均主义等逆市场机制的思潮。

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实现贫富和谐的目标，必须把握好两点：一是收入分配的公正原则，而公正首先来自符合效率原则初次分配；其次是收入分配的机会均等原则，而机会均等原则首先是市场竞争机会的均等。只有牢牢把握这两个原则，才能确保财富持续充分涌流的源泉永不衰竭。如果国家政策过度向社会弱势阶层倾斜，让“怀弱”极端为“民粹主义”，让全体人民都完全“平等”起来，必然会影响经济效益，减少财富增长，最终不利于解决社会弱势群体问题。

调节收入分配，关注弱势群体，实现贫富和谐，首先是政府的职责。政府必须在这个问题上有大的作为。而政府要有效地调节收入分配，不能“东按葫芦西按瓢，眉毛胡子一把抓”，首要的任务是要建立一个有效的制度。我在1999年提出了“制度更是第一生产力”、“人跟着利益走，利益跟着制度走”的观点，一个好的、有效的制度不仅是推进生产力发展关键，也是解决财富分配、协调利益关系、促进贫富和谐的关键。这就要全力打造全社会的利益协调机制。这种机制包括利益表达的机制，利益的谈判和博弈机制，利益冲突的解决机制等。从我国现实存在的严峻问题来看，首先要重点解决好以下六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方面是要为解决官民的利益矛盾进行有效的制度化安排。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制度上解决腐败和廉政问题，从而在民众思想深处消除“仇官”心理（实际上是“仇腐”心理）；二是从制度上解决各级官员的勤政问题，真正为民众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带来看得见的利益。

第二个方面是要为解决城乡利益矛盾进行有效的制度化安排。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制度上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真正取得实效；二是从制度上打破城乡